

试述抗战时期的《东南日报》

何扬鸣

内容提要 《东南日报》是抗战时期在东南地区的一份著名报纸,为宣传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本文叙述了该报在 8 年抗战中艰辛备尝的播迁历劫;为全面抗战、坚持抗战、抗战胜利所做的宣传;专门分析了该报所办的一个著名副刊《笔垒》;还检讨了该报对中共的矛盾态度。

关键词 《东南日报》《笔垒》 宣传抗战

1937 年 7 月 7 日,北平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枪声,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。当时,正是《东南日报》跻入了全国性的大报行列,为世人所注目的时期。卢沟桥的枪声打断了它的正常发展,使它从顶峰往下滑坡,开始了它的磨难时期。然而,这段时期也正是《东南日报》历史上最值得称赞的时期。

淞沪战役期间,杭州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,但是《东南日报》仍照常出报,迅速及时地报道抗战的消息。敌军在乍浦登陆后,中国军队全线崩溃,杭城也危在旦夕。《东南日报》决定迁社。社长胡健中,总编辑刘湘女、编辑课长金瑞本及电讯股印刷股重要职员工友,则仍留杭工作,设法每日在杭州发行号外,直至 12 月 22 日。两天后杭州沦陷。

11 月 18 日,《东南日报》发表了社论《本报暂迁金华》,向各界读者解释《东南日报》为何要撤退离杭的原因,说离杭迁金仅是一种战略撤退,是为了蓄积文化火力,准备持久抗战,把报纸的一字一句都变成枪火炮弹,与日寇周旋到底。“今吾人挥手别矣!八婺山水,相距匪远,本报当充分利用邮递,藉与杭市读者如旧见面,而吾人身虽在婺,精神固仍在杭,但愿此去仅为小别,他日湖山无恙,橐笔归来,话小劫之人天,叙阔离之情绪,愿共读者益矢精诚,以迈进于民族复兴之大道!” 11 月 19 日,《东南日报》再次发表了社论,重申了上述的意思和决心:“此本报于迁婺之余,感怀过去,瞻瞩未来,一棹双溪,徘徊独切,缅中流之击棹,指白水以为盟,从是发奋为雄,湔复前耻,所愿与我两浙同胞,相期共勉者也。金华古称文物之区,年来公路铁道,四通八达,已渐次蔚为东南文化之重镇。北山峥嵘,婺江滔涌,尤足以振奋我文化阵线之士气,是殆我东南民族文化复兴期之安哥拉乎?愿自今日始,与我东南人士,以最迈步向此艰难荆棘之大道挺进。” 这两篇社论写得十分悲壮,读后令人百感交集。

《东南日报》的前身为《杭州民国日报》,创办于 1927 年。经过 10 年的惨淡经营,《东南日报》在杭州庆春路众安桥建成一座宏伟的报社大楼,其规模即为当时全国同业之首,印刷设备全部进口,是国内新闻同业中第一家使用轮转机印报,早于上海老牌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等实力雄厚的大报,令同业刮目相看。至 1937 年,发行由东南各省推至全国,“即欧美日本亦有经常订户”,销数增至 5 万份以上,位于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之后。社长胡健中曾于 1937 年

《本报暂迁金华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7 年 11 月 18 日。

《本报迁金出版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7 年 11 月 19 日。

《东南日报社务概况》,1948 年 3 月 10 日,藏于浙江档案馆。

撰文写道：“吾人检阅过去，把握现在，而瞻望将来，觉初基既固，前程正远，惟吾人初不敢以此自满，盖信夫自满乃进步之大敌，吾人但知努力迈进，始终不懈，以吾人往日工作与其代价视之，尤深信夫前途之光明。雄驹在途，吾人今又扬鞭行矣！邦人君子，幸辱教焉！”这是《东南日报》历史上最盛时期，报社同人对前途是踌躇满志。

抗战的爆发，打断了《东南日报》的发展。从1937年8月5日起，报纸缩减篇幅，从原来4大张改为2大张，即将原来第三四张中的所有副刊《沙发》、《社会服务》、《商情》、《画刊》等稿件，一律酌量归纳于一二两张之中。当时，报社还以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措施，表示一旦困难稍纾，当即恢复原状。然而，就从这次调整起，《东南日报》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节假日外，再也没有恢复过日出4大张的状况。11天以后，战局日趋紧张，《东南日报》再次压缩篇幅，每日只出版一大张。金华的环境比杭州更差，《东南日报》金华版创刊时，仅为直式一张，就像《东南日报》在纪念该报迁金华出版一周年时所说的那样：“按去冬本报初迁金华，以历劫之余，凡百设备，均极简陋。销数既形锐减，收入尤感微薄。当此之时，吾人几惶然不知何以措手足。”当本报在杭时，以十载经营，新式生产工具，差称完备。迁金出版后，微特上项工具，损失无法补充，即可补充，亦绝非工业条件贫薄如金华者所能容纳。本报现所使用之生产工具，泰半窳劣，较诸昔日，直不啻相隔半世纪。”

《东南日报》迁移到金华后，人们鉴于日军气焰嚣张，都劝《东南日报》西移，国统区也盛传该报将迁到湖南或湖北，有的甚至说报纸将迁到云南或重庆。从报纸本身考虑，若迁移到工商发达、交

《东南日报小史》，《浙江青年》第3卷第3期，1937年。

《本报迁移金华出版一周年纪念日献辞》，《东南日报》1938年11月19日。

通发达、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,势必对报纸发展有利。但《东南日报》拒绝西迁,它在湖南湖北的报纸上刊登启事,阐述其立场,表示誓死守住东南这个最后文化堡垒。它说,它在浙江刊行了 10 年,“与两浙人士休戚相共之谊,痛痒相关之情,久而弥笃,危而益挚,临难苟免,义不当为,且妄思苟全,又无以自解。是故困守金华,保此残垒,虽厄于环境,不能广拓销路,增加纸张,扩大篇幅,然已决心效死勿去,支持到最后之一刹那,以与浙土共存亡”。《东南日报》在 8 年抗战中自始至终在抗战前线出版发行,也是抗战 8 年中唯一一份在抗战前线出版发行的大报。

《东南日报》在金华支撑了 4 年多时间。这 4 年多时间,虽屡遭日军的威胁,但业务仍能日趋稳定。1942 年 5 月间,浙赣战役爆发,日军进攻金华,《东南日报》才撤至江山,嗣后复由江山经硤口、二十八都、浦城、水吉直至福建南平。自 5 月 21 日撤离金华以迄 8 月 21 日在福建复刊,计时 3 个月,自金华辗转播迁至南平,计程千余里,员工及家属将近千人,间关跋涉,远道奔波,饱尝颠沛流离之苦,中途被炸死、失踪以及积劳病逝者,竟达 62 人之多。而且,他们刚到南平时,因经过长途辛苦的跋涉,职工及家属贫病交迫、衣衫褴褛,形同乞丐,受到轻蔑和侮辱,甚至还曾被军统江山站诬认为汉奸间谍集团。

另一路迁移至丽水,出丽水版。丽水版原本创刊于 1941 年日军渡钱塘江窜向金华之际,自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仅维持 4 个月,后因金华局势渐趋稳定,暂行停刊归并。浙赣战役爆发后,丽水版恢复。丽水版又于 1944 年 12 月 8 日改为云和版。从丽水版至云和版,首尾 5 年,除 1941 年因自动停刊外,中间因丽水沦陷而停刊两次,因社屋被炸而停刊一次,每次播迁,报社物资损失均极

《本报十周年纪念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8 年 4 月 27 日。

惨重,员工及家属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。

1943年3月30日和31日、4月1日,日军接连3天对丽水进行狂轰滥炸,《东南日报》丽水版于3月31日和4月1日,两次被袭击,编辑部、电讯室、职员宿舍及机器仓库,完全炸毁,无法工作,不得已于4月1日起暂时停刊。他们在废墟中重建新屋,整理工场,补充器材,奋斗了10天,于4月11日起恢复出报,发表社论《以复刊答复轰炸》。社论说:“本报开支全赖营业收入,在现时物价高昂成本加重之日,本已入不敷出。经此打击,损失重大,更有‘雪后加霜’之感。但‘我们是倭寇最大的敌人’,六年来我们的笔垒墨堡,始终摆在第一线。六年来用我们的笔锋,不断地于敌人以严重的刺激。六年来我们工作的累积,在一般人看来,仅是数千万张薄纸,而在敌人看来,却不啻数千万枚炸弹。因此恨之切骨,而给我们的损害也最惨重。抗战到现在,我们的损失是一串庞大的数字……如果把这些数字拿来和这次轰炸作一比较,则此番本报的损失实微小而不足道。而且‘我们是倭寇最大的敌人’,所以我们冷静地忍受敌机的轰炸,并泰然地接受这次损失”。“本报为一不设防之纸寨,过去如此,今后依然。‘我们是倭寇最大的敌人’,今后敌机也许要继续轰炸本报;而为着前方数十万军民的精神食粮,为着继续不断予倭寇以严重的打击,我们不撤退,我们不迁移,我们更不躲避。一日本报不炸毁,我们工作一日;如果再把本报炸光了,我们若尚剩一分力量,一定立刻复刊,而这一次便是明显的例证!”

原打算暂别杭州,但最后一别竟是8年。8年中,《东南日报》播迁历劫,艰苦备尝,物资损失之浩大,员工及家属牺牲之惨重,在国统区报界中当推首位。8年中,《东南日报》没有垮过,不断地遭

《以复刊答复轰炸》,《东南日报》1943年4月11日。

受打击,不断地掘起。除杭州版外,它还先后发行了金华版、丽水版、云和版、南平版。8年中,《东南日报》的销数也不小,如南平版的销数,除各省不计,仅福建就遍及了各县各乡镇。南平版和云和版加起来,日销3万余份,可谓“一纸所及,遍及东南”,“一方面虽有都市之丧失,另一方面则正作乡村与边僻区域之深入。”

二

卢沟桥的枪声传来后,浙江省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,对此,《东南日报》予以及时报道:《芦沟桥日军挑衅,本省各界同伸义愤……省农业会商会等联电激励宋哲元,杭小学校长筹款慰劳抗敌将士》、《浙江省党部,电二十九军诸将士,率两浙民众为后盾……本省各界对保国土忠勇将士纷起响应》、《前方接战激烈,后方应努力准备,省市当局连日召开紧急会议,绸业公会筹募防毒面具药品,各职业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》、《平津陷落应战开始,本省各界奋起应付,省会抗敌后援会昨开执委会分配工作,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》、《壮悲穆肃,昨省各界追悼佟赵二将,参加机关团体代表五百余人,派队乘车绕行全市散发传单》、《节衣缩食以储物力,作长期抗战后盾,浙省抗敌后援会电告民众,即日起实行节约广事积储》……

以上这类文章在《东南日报》上比比皆是,对无论是促使政府当局尽快把工作重心转入战时轨道,还是广大人民作好心理准备,都很有必要。同时,《东南日报》几乎每天发表抗战的社论和专论。如:《准备全面抗战》、《为日本违约挑衅,昭告世界友邦》、《准备自

转引之蔡德邻:《抗战时期 东南日报、浙江日报 南迁片断》,《浙江方志》1990 年第 4 期。

卫》、《论北平芦沟桥之守战》、《严守国家立场》、《发动全面抗战》、《抗战胜利之先声》、《以全人格者图生存》、《论抗日战略》、《国民心理的测验》、《速战与持久战》、《积极抗战与长期准备》、《能战而后能和》……综合起来,这些言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:

第一,要全面抗战。7月15日,《东南日报》针对日军反复无常,调兵遣将,不肯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情况,发表了题为《准备全面抗战》的社论,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全面抗战的问题,并希望集中全国的力量,加紧作好全面抗战的准备,以应付局势的突然恶化。7月27日,《东南日报》又发表了题为《发动全面抗战》的社论,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国内一些人的和平幻想,指出:“国难以来,邦人对敌国外患的压迫,是吞声咽声地尽量忍耐着,而今事实证明,忍耐已经不是办法了,‘挨打’式的抗战,也须由消极的转变成为积极的了,就是‘一面交涉,一面抵抗’的口号,也有重新估计其价值的必要”。“含生之道,莫不知为自卫而抵抗。现在国难日亟,已到了全民族非拼命不可之时,自卫、抗战,总是千真万确的出路。”由于《东南日报》在抗战前夕正处鼎盛的发展时期,跻身了全国大报的行列,在全国,尤其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东南沿海地区,拥有广泛的读者,其抗战的态度和言论,对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无疑有积极的作用。

需要一提的是,《东南日报》鼓吹全面抗战,反对妥协,反对投降的立场是一贯的,从来没有动摇过。1938年12月,汪精卫投敌,响应日本灭亡中国的“近卫三原则”。在国统区新闻舆论还奉令保持沉默的情况下,《东南日报》率先发表社论对汪精卫的卖国求和言行予以抨击,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和重视。

第二,鼓吹持久抗战。8月4日,《东南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论

《发动全面抗战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7年7月27日。

抗日战略》的社论,指出:“中华民族之对日抗战,能否获得最终之胜利,在战略运用上,关系至为重要。”文章分析说:“(一)就空间言,此次日本侵华,系倾举国力量,我方抗战,更宜全国一致,故战事不发动则已,而一经发动,即非局部的而为全面的战争;(二)就时间而言,日本利速战,而我则利于持久战,故国民对战局发展,目前不用焦躁,而一时小胜小负,尤宜认为无关于终局之得失;(三)就性质而言,对日战争为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之战争,故在战略方面,当与帝国主义相互间战争所采取者不同;(四)就范围言,战争胜负之取决,不仅为军事上之角力,而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总动员之力量,所关尤大。”8月10日和11日,《东南日报》又发表了《速战与持久战》和《积极抗战和长期准备》两篇社论,进一步从国内外诸种因素上论述持久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文章精辟地指出:“战事一开始,敌方必采‘速战速决’的猛烈进攻方式,企图一举使我溃蹶不振,这所用的是刚性战略,与我方的柔性战略不同,柔性战略利于战争的持久,并不希望一举取胜,它一面以游击战术困扰敌军,一面利用敌国政治经济的弱点,静待其内部起了激烈变化之功。这样的战争,是长期的,持久的,以柔克刚的,战事既必然爆发,自无须汲汲于迟早的一时问题。”

抗战时期《东南日报》的副刊《笔垒》,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报纸副刊,在国统区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它在文学艺术方面,宣传抗战思想,透露一些人民的呼声和一些民主自由解放的信息,团结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,教育和培养国统区进步青年,尤其是进步的文化青年等方面,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可以这样说,抗战时期《东南日报》的声誉与《笔垒》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。《笔垒》创刊于

《论抗日战略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7年8月4日。

《速战与持久战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7年8月10日。

浙江金华,时间是1938年2月7日。那时《东南日报》从杭州撤到金华后刚喘了一口气。《笔垒》的发刊词指出:

这是我们以笔墨筑成的新的堡垒。

如果文人的一杆笔真个可以等于若干支毛瑟枪,让我们把枪口对准敌人的胸膛放射!如果所谓“一字之贬”当认比斧钺还要锋利,让我们紧握这利斧来劈掉汉奸们的脑袋!如果一首诗一曲歌能唤醒我们的国魂,能使我们为国捐躯的英雄垂诸不朽,那更让我们绞尽我们的脑汁!

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战垒,但假使我们据守其中,效死勿去,安知这不是我们东南文坛上的“马奇诺”战线?文坛上的斗士们呢,大家来誓死守住这个据点!

这篇没有署名的发刊词是社长胡健中执笔的,虽然很短,但是写得慷慨激昂,富于激情,很有感染力,尤其“效死勿去”一词在报社中流传开来,影响很大,成为报社中的一句口号。

在《笔垒》上经常有民主人士和著名新老作家的作品发表,如冯玉祥、靳以、王西彦、羊枣、陈伯吹、王造时、王季思等都经常替《笔垒》写稿。《笔垒》的编辑何永德、陈向平等也为《笔垒》写了数百篇文章。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、宣传抗战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。

《笔垒》上曾有题为《人类之耻——朝鲜妓女学校参观记》的文章,说的是在朝鲜平壤光练亭附近有一座日本人专门培养朝鲜妓女学校,那里衣衫褴褛,胡髯满目,一副贫弱脸颜的乐师们,刻板地移动着手,揉着胡琴、瑟箫、长鼓、大鼓,20多位少女,则载歌载舞,唱着《宫廷宴夜曲》。教师是一位60岁左右的名叫朴明河的女人,她从13岁起就以神女的身份出现在平壤了。在另一间教室

《发刊词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8年2月7日。

里,有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少女,在作着古风的“剑舞”。这个妓女学校有学生 120 名,每年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七八十名,大凡快要毕业的一班,都要来一次“美人”的选举。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时,还强迫大批亚洲妇女充当“慰安妇”,作日本士兵的性奴隶。这是铁的事实。如今,日本一些政要接二连三地大放厥词,为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政策辩护,说这是公娼制度带来的结果。这篇文章有力地揭露了日本一些政要的无耻谰言。

《笔垒》上的文章呼吁坚持抗战,鞭挞反共倒退逆流,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未来光明的憧憬。编辑钱今昔来自上海,1943—1944 年间,他在《笔垒》上以连载的方式写了 14 篇总标题为“上海风景线”的通讯报道,内容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翌年 4 月他在上海目睹日军和汉奸血腥屠杀人民,剥削欺压人民的情况。在写作“上海风景线”时,中共地下党员陈向平和钱今昔就经常讨论如何提炼素材、突出中心,掌握明攻日军汉奸,暗刺国民党顽固派的手法和分寸。陈向平也曾用“双溪一士”的笔名写了多篇反映浙赣线撤退概况的报告文学,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队的野蛮罪行,反映了人民的痛苦,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。

《东南日报》在抗战时期所作的抗战宣传,是认真、严肃,颇有成绩的,许多方面,即使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也不乏真知灼见。这些我们都应该予以肯定。

三

8 年抗战时期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。1937 年 7 月 9 日,红军通电请缨赴前线抗日。不久,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,开

张十方:《人类之耻——朝鲜妓女学校参观记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9 年 2 月 4 日。

赴华北、华东、华南敌后,开展游击战争。这些,号称“中间偏左”的《东南日报》都有较详细的报道和评论,如:《国府下令减刑,释放陈独秀,入狱三载深自悔悟,究其既往藉策将来》、《陈独秀出狱,将谒中枢当局请训》、《朱德彭德怀就八路总副指挥,改编已竣,东进杀敌,誓灭日寇收复失地》、《朱彭就职感言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宣言,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奋斗,取消赤化暴动停止没收土地,取消苏维埃红军编为国军,团结御侮挽救危亡》、《对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,蒋委员长发表谈话,愿在三民主义下抗敌御侮者,无分派别政府无不开诚接纳》、《所部集中听候改编,巩英抵南昌请示,表示服从蒋委员长领导抗战》、《赣党政纪念周,项英演说,精诚团结发挥力量,最后胜利必属于我》、《访叶挺项英》……

从上述报道和评论的标题可以看出,《东南日报》在抗战爆发初期报道中共方面的情况完全是站在“正统”的地位,居高临下地作了错误的理解和解释。这点,1937年9月13日的社论《朱彭就职感言》更可明证。社论说:“夫以赤军之窜扰频年,流离转徙,际水尽山穷之时,作翻悔投诚之计。此盖积无数颠沛困苦之经验,始觉悟共产主义之不适于中国,始情愿放弃其过去错误之主张,以毅然走上三民主义救国之大道。此一觉悟,可证实本党理论之正确性;而共党之所以终于转变路线,皈依本党,要即说明此正确性的理论之最后战胜。从此民族利益,高于一切!阶段斗争,不容存在!倔强如共党,而有此觉悟,庶几国民革命乃真走上顺利而光明之坦途乎?”

但不管怎样,《东南日报》还是对国共合作表示拥护,对八路军、新四军寄予希望,称“此一支以擅长游击战略著称于世之生力

《朱彭就职感言》,《东南日报》1937年9月13日。

军将有如何惊人之功绩表现于后乎？吾人拭目以俟之。”事实回答了疑问，不久，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全歼日军千余人，取得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首次大胜利。消息传来，全国人民为之振奋鼓舞。9月28日，《东南日报》报道：《浙江省党部，电八路军祝捷，克敌平型倭虏斩俘殆尽，尚祈乘胜长驱复我失土》。几天后，题为《守住山西》的社论又分析了平型关大捷的意义：“这一仗的可纪念处，是将山西战场敌军主力的第五师团打得落花流水，是使板垣避开雁门天险而乘隙袭入山西长城内线的计划为之粉碎。”之后，有关八路军的消息不断地在《东南日报》上出现，如《八路收复平鲁向西北推进》、《八路军仍在雁门关外游击》等等。至于平绥线战地记者何永德对八路军的报道就更多了。1939年，周恩来对东南数省进行抗战视察，为此，《东南日报》作了一系列报道。这无论对扩大周恩来当年东南之行影响，还是今天了解他的东南之行，都有意义。如1939年4月2日，《东南日报》就有这样一篇文章：“周氏在浙西公毕后，即往绍兴原籍一行，业于4月1日上午遄返金华，今明日即离浙转赣。记者再赴旅邸访问，据谈，本人此行，途行淳安、桐庐、分水、于潜、萧山、绍兴、诸暨等县，并登天目山，印象良佳，浙西一般民众抗战情绪热烈，冲过钱塘江，收复杭嘉湖之声浪响彻云霄，且浙西来自沦陷区域之青年干部，正磨励（砺）以须，时作慷慨悲歌之词，有不复河山誓不休之慨。”周恩来认为“大禹王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，均足以资模仿”。他希望“吾浙人士，应提高战斗精神，以保卫此后家乡”。

同时，共产党人写的文章也不时地在《东南日报》上出现，如

《朱彭就职感言》，《东南日报》1937年9月13日。

《守住山西》，《东南日报》1937年10月5日。

《周恩来返抵金，今明日即转赣》，《东南日报》1939年4月2日。

1938年10月21日,《东南日报》有一篇叶剑英的专载《论日寇进犯华南》;1940年2月16日,第558期的《笔垒》上,有高岗写的一篇文章《战争教育了人民》。

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,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,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,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,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。作为国民党报纸的《东南日报》在这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反映,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章和言论时有出现,如1940年年底,发表了两篇题为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》和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》的社论写道:“即使某一军队发生违反军纪之事件,则其心理上已为反常之行为,反统一之行为,必须受命令之制裁,制裁之无效,则应以国家最高军事行政权力绳其后”。“假使任何军队有违反统帅之命令,即不啻直接破坏军纪,间接违反国法,为国家及人民之共同奸蠹;假使任何军队有危害抗战便利私图者,即为妨碍统一,阻滞胜利,衡之于抗战建国纲领之条文,衡之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标,皆在必议必罚之列”。“假使今日犹有某种党派之人士,以取得党派之地位与权利为得计,而不顾民族全体之利害与存亡者,则为自私自利之企图;又假使今日犹有某一集团之部队,以乘机扩张其防区与实力为得计,而破坏军事行政之系统与法令者,则为大奸大蠹之行为,充其企图与行为之所及,必至牺牲民族利益,破坏抗战计划而后已。”

皖南事变发生后,《东南日报》对中共和新四军进行了无耻攻击和诬蔑,极力为国民党评功摆好,极力为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,破坏抗战的罪行开脱,如社论《严由军纪处置叛军》、短评《对新四军叛变问题》等就大放厥词称:“新四军最显著之叛迹,为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,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,对商定后提示的方案则延宕

转引自《严由军纪处置叛军》,《东南日报》1941年1月19日。

不遵,而岂意以非法越轨扩充实力为常图,此不特使袍泽寒心,且直为敌寇张目;不特自由行动,抑且使抗战力量如冰炭之相消;综观各地历次大小不幸事件,皆托于人多饷少之妄说,而实行不遵中央编制,自由扩充部队,其饷额有所不给,则就地征取;此皆摩擦事件之根本,非法行动之事实也。试问以如此不守战区范围之自由行动,以如此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之用心,以如此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之叛迹,以如此不打敌人专并友军之集团部队,其最后居心何在?最大作用何在?最恶影响如何?任何人皆可片言置答。”

总之,抗战期间《东南日报》对待中共的态度比较矛盾。这种现象,不仅抗战期间存在,即使在其他各个时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究其原因,这与《东南日报》是国民党的报纸,其基本立场属国民党的,和报社标榜“文人论政,中间偏左”的方针,报社内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有关。

(作者何扬鸣,1957年生,浙江大学新闻系副教授)

(责任编辑:李仲明)

《严由军纪处置叛军》,《东南日报》1941年1月19日。